

“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”（上）

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永恒魅力



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、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，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，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、最可亲的组成部分，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，所谓“于道最为高”“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”。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，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。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。

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

儒家在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上，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，就是善于“杂于利害”，见利思害，见害思利，讲求“适度”，不走极端，体现出浓厚的朴素辩证

认识论精神。

有句名言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，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内部，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、互为渗透的属性，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。

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、相互依存的观点、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治国安邦问题。在他们看来，其理论的基本范畴，如“德刑”、“礼法”、“治乱”、“宽严”、“义利”、“王霸”等等，无不以相互依存、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，一方不存在，对方也就不存在。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“美丑、难易、长短、高下、前后、有无、损益、刚柔、强弱、祸福、荣辱、智愚、巧拙、大小、生死、胜败、静躁、

轻重”一样，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。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，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、互为渗透的属性，都包含有“利”与“害”的两种倾向。天下万事万物，没有无害之利，也没有无利之害，两者如影随形、相生相成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，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，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。因此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，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，趋利避害，防患于未然，制胜于久远。

为此，儒家才坚定地提倡“适度”原则。儒家普遍认为，凡事都必须坚守大法，做到不偏不倚，无过无不及，具

体做法便是“执其两端而叩之”，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，辩证看待问题，凡事不走极端。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：如天人关系方面，既不否定鬼神、天意的存在，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；政治秩序方面，既肯定君臣尊卑、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，又主张“臣事君以忠，君使臣以义”；文质关系方面，既注重内容，又注重形式，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；理想追求方面，既追求大同，“祖述尧舜”，又憧憬小康，“宪章文武”。总之，一切要“允执其中”。

“允执其中”，就是要避免“过犹不及”极端情况的发生。譬如，“礼”“乐”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与鹄的，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，但是，一旦过“度”，则必然走向反面，背离其初衷：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。”所以，反映在治国问题上，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，必须做到文武并用，刚柔相济。而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

求，必须做到谦益节制，兼容并蓄。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，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，走向自己的反面。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，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，急于求成，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，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，必要时需安于现状，所谓“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”。一句话，目前是什么状况，就安于什么状况，不羡慕分外的东西，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，博采所长，使品德各异、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。

不断强调的“忧患”意识

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，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，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，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，这就是强烈的“忧患”意识。

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，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，即朝乾夕惕，忧患系心。孟子尝言：“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，又说“人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。欧阳修也强调指出：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